

台灣日治時期日本風情建築

傅朝卿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前言

作為一個殖民者，日本政權在統治台灣之後，當然不會放棄引入各種日本文化，以期在殖民地地上形塑母國文化，在文化上是如此，在建築上自然也不例外。因為政治意涵、文化意涵、懷鄉情結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各種不同日本風格的建築也於日治時期開始傳入台灣。在當時，神社、武德殿、傳統佛寺、日本劇場、日本宿舍、日本旅館、料理店及日本花園中都很容易可以看得呈現日本色彩的東洋風情，而其它建築中也有局部使用日本風格的情況。這種來自東洋建築的影響至今仍可以普遍的可以於台灣的建築中發現，許多住宅中的玄觀與和室已是不少人們生活空間的一部份，而充滿東洋裝飾的日本餐廳更是舉目可見。在台灣日治時期展現東洋風情的建築中，依其屬性可以歸納為「傳統日本式樣建築」、「日本古典式樣新建築」及「內涵質變的傳統日本式樣建築」三大類。

傳統日本式樣建築

所謂的「傳統日本式樣建築」是指依日本本土各種傳統建築約定俗成的形式與構造所興建之建築，基本上是一種全盤移植的模式。由於日本傳統建築中不同的建築類型常會有其獨特的規制，若依此而分，台灣日治時期出現的「傳統日本式樣建築」也約略可以分為「神社」、「寺殿」及「民居」三大類。

神社是最具日本道統色彩的建築，其建築都依一定的規制而建，可稱為「神社式樣」，主要特徵依傳統日本神社建築之空間與造型構成，鳥居與屋頂上的千木、堅魚木、破風、破風板、鬼瓦板、懸魚是其特徵。日治時期，日人在不同時期總共以傳統式樣及構造方式興建了兩百多棟大小不一的神社，這種舉動明白的顯示出日本殖民者意圖在台灣廣佈日本文化之心。台灣神社（1901，伊東忠太）、台中神社（1912，伊藤滿作）、嘉義神社（1915，伊藤滿作）、台南開山神社（1915 改建，島田宗一郎）、台南神社（1923，森山松之助）及高雄神社（1912，岡本源造）等都極為有名。可惜戰後日治時期興建的神社大多因政治因素而拆除或改建，只殘留部份或無跡可尋，目前只有桃園神社（1938，春田直信，今桃園忠烈祠）是唯一保存較為完整一座，精美樸素之木構造頗具唐朝風格。除了神社之外，在某些需要傳達日本神道色彩的特定的準神社類紀念性建築物中，也會被採用神社式樣，後來擴建為台南神社的原北白川宮御遺蹟所（1902）與擴建自原學務官寮遭難碑址的芝山巖（1927）即為二例。

除了神社之外，日治時期也有不少建築依傳統日本寺殿建築之空間與造型構

成所興建，以求表現日本風情，其中以武德殿、佛寺及劇場數量較多，可以統稱為寺殿式樣。主要特徵依傳統日本寺殿建築之空間與造型構成，屋頂、柱子、虹樑、斗拱、臺股及木鼻最具特色。此式樣之建築可能是木構，亦可能是鋼筋混凝土仿木構。武德殿是除了神社之外，另一種最具日本色彩的建築類型，是日本人練習武術之場所，日治時期普遍設於城鎮與機關學校之中，為數亦多，起初都為木構造，1920年代以後逐漸改建為鋼筋混凝土，高雄武德殿（1924）、彰化武德殿（1930）、大溪武德殿（1935）、台南武德殿（1936，台南州土木課營繕係）與南投武德殿（1938，鈴木金吉）是現存情況較佳者。

在佛寺方面，日人於日治時期引進日本佛教共有八宗十二派，其中以真宗本願寺派、曹洞宗、臨濟宗與淨土宗信徒較多。截至1941年（昭和十六年）的統計，台灣一共有日本佛寺六十五座。這些日本佛教宗派在興建新的寺院時，也都會使用與台灣本土佛寺閩南風格差異很大的日本傳統佛寺的式樣，有些是依循傳統的木構架，有些則以加強磚造或鋼筋混凝土仿木構而建，鎮南山護國臨濟禪寺（1912，圓山護國臨濟禪寺）、北投普濟寺（1920年代）、虎尾禪寺（1920年代）與金鳳山員林寺（1931，鈴木金吉）屬於前者，台北東和禪寺（1910，入江善太郎，只遺鐘樓）、中和圓通禪寺（1926）、台中寶覺禪寺（1927）、白河大仙寺（1930）與淨土宗台北別院開教院本堂（1937，舊善導寺，已拆）屬於後者。在劇場方面，台南的宮古座及台北的榮座均甚為宏大。

另一方面，日本傳統民居式樣也於台灣日治時期持續出現於各地的日本人宿舍、旅館、料理店與溫泉浴場之中。主要特徵基本上含有傳統日本民居建築之空間與造型構成，使用日本瓦，壁材常基部為磚上為雨淋板等木構件，有些應用部份洋式構件。已不存的日月潭涵碧樓（1900年代）、關仔嶺公共浴場（1914）、宜蘭公共浴場（1915）及台灣軍司令官官邸（1929，淺井新一）均擁有濃厚的日本風情。在現存的例子中，台北梅屋敷（1900，國父史蹟紀念館）、宜蘭廳長官舍（1906，宜蘭設治紀念館）則是已經重新規劃後的建築。而台灣各地興建的招待所及為了接待經常到訪皇族及皇太子於1923年（大正十二年）訪問台灣的皇室行館，基本上也多採民居式樣，角板山貴賓館與薰風閣（1914，舊蔣介石行館與復興山莊）、金瓜石行館（1923）及阿里山招待所是為代表。

日本古典式樣新建築

因現代主義之崛起而退居次要角色之古典主義思潮在平靜了幾年之後，又於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復辟，其主因乃是當時盛行的民族政治意識型態。這種現象在崛起於此時之極權政府（義大利、蘇聯和德國）中顯得特別的明顯。在亞洲方面，日本之建築界也於1920年代起，面臨了到底要選擇國粹主義之古典式樣或是國際主義之論辯，以鋼筋混凝土建造日本各類傳統式樣之風氣也隨之在此期間展開，台灣則是於1930年代後也開始出現帶有濃厚意識型態之日本古典式樣新

建，其中幾個重要之建築是集中於高雄地區，這當然與高雄在當時被日本視為南進東南亞與太平洋島嶼之最主要基地有直接的關係。「帝冠式樣」與「興亞式樣」是日本古典式樣新建中兩種最特別的式樣。

所謂的「帝冠式樣」建築其實是源自於下田菊太郎之對 1923 年（大正九年）日本國會議事堂競圖作品提出該採用「帝冠併合式」而來。就建築構成而言，這種式樣是指基礎及屋身採用西方古典建築形式，而屋頂採用日本皇宮建築慣用的固有式樣，其他各部則取各類建築之長經消化後合併使用之建築。主特徵有日本大傳統屋頂及西方歷史建築之屋身與裝飾，兼容東西方元素的柱頭與其它日本趣味裝飾。在這種態度之下，一棟帝冠式樣的建築通常會同時兼具日本大傳統屋頂及西方古典建築之屋身與語彙。日本京都的京都市美術館（1934，京都市建築課）與東京帝室博物館（1937，今國立東京博物館，渡邊仁）即為日本本土之帝冠式樣作品。在台灣，真正發展成較成熟之作是高雄市役所（1938，前高雄市政府，今高雄歷史博物館）與高雄驛（1941，今高雄驛）。

台灣近代建築界中另外一項日本古典式樣新建築乃是所謂的「興亞」式樣建築，此種式樣之興起乃是自國粹主義在日本抬頭，日本軍國主義向外擴張後，在日本本土及海外佔領區以日本趣味加之鋼筋混凝土現代屋身後形成之建築。主要特徵為日本傳統屋頂（不一定大屋頂）以及近代建築之屋身與日本趣味裝飾。當然所謂「帝冠式樣」及「興亞式樣」其出發點並不相同，但是其於建築構成上之本質從某個層面上而言差異並不大。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強調是日本趣味之大傳統屋頂加上西方古典建築之基座及屋身而後者則是加上較簡化之現代式屋，不過此差別有時是極難分的十分清楚。日本名古屋市廳（1933，名古屋市土木部建築課）與東京軍人會館（1934，川元良一，今九段會館）都是興亞式的建築。在台灣方面，大阪商船台北出張所（1937，渡邊節）及產業金庫高雄支部（1940 年代初）是為代表。除了上述兩種式樣外，一九三〇年代中所興建之高雄州廳（1931，高雄州土木課）、台北高等法院（1934，總督府官房營繕課，今司法大廈）及澎湖廳舍（1935）則也別具特色。這幾座建築基本上都有西方歷史式樣建築之構成，但卻都有局部之日本趣味裝飾及變形之日本屋頂，有些日本學者將之稱為「日本趣味建築」。

內涵質變的傳統日本式樣建築

1937 年（昭和十二年）以後，台灣雖然是處於一種戰爭體制之中，各種傳統日本式樣建築仍然持續的出現。就建築之構成而言，這些建築與以前之同式樣建築並無多大差異，但是在機能本質上，卻因為軍國意識型態之導入而使建築之本質產生變化，使單純的傳統建築沾染上政治之氣氛。1937 年中日戰爭後，日本政府更企圖藉由神道之崇拜來表彰忠烈，激發軍國及愛國思想。1939 年（昭和十四年）三月，日本本國各地之招魂社改為護國神社。在台灣方面，則由總督

府在台北大直（今圓山忠烈祠址）創立一「台灣護國神社」，1942年（昭和十七年）五月完工。在台灣護國神社中所供奉的有為日本殉職中與台灣有關之人，包括有中日甲午戰爭時病死於彰化之陸軍少將山根信威等人。

除了護國神社之設立使台灣神社之內涵與日本本國之靖國神社有了內容上之呼應外，台中神社亦於1940年（昭和十五年）改建，並且與新竹神社於1942年（昭和十七年）十一月同時昇格成為國幣小社。在此之前，台灣只有台北之台灣神社及台南神社屬於格局較高之官幣神社，可以推展政策事宜。配合1941年（昭和十六年）四月開始的皇民奉公運動，台灣總督府藉由台中及新竹兩神社之昇格，增加了兩個可以推行皇民化運動之中心。此外台灣神社也配合大肆整修，於1944年（昭和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於台灣始政四十九週年當日，改稱為神社中最尊貴的稱號，成為「台灣神宮」。神社之昇格與改名，在日本神社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而台中、新竹與台灣神社社格之改變發生於太平洋戰爭轉趨激烈之時，與日本當局希望藉此賦與神社更高之皇國權威，強化思想中心以扭轉戰力有必然之關係。

除了神社產生質變之外，日本為了配合戰爭之需，於1937年九月開始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竭力推廣所謂的「八紘一宇」及「舉國一致」之精神。台灣因其南進基地之特色，所以推廣國民道德以貫徹神道精神及皇民化之效為日本殖民當局所急欲達成之目標，同時也鼓勵青年參與有教化性質的團體活動。此期間所興建之台北國民精神研修所（1937）與台中州產業組合青年道場（1939）也均負有此種任務。二者均是木構造，在空間配置雖以機能考量為主，但在造型上均為民居式樣。

除了公共建築外，為了徹底推動皇民化，日本殖民政府也在台灣百姓之民宅正廳擺設上推動近乎強迫性之改造。1936年（昭和十一）十一月台灣總督府舉行「神宮大麻」（一種代表天照大神的神符）頒佈儀式，改以硬性規定每戶於家中供奉神宮大麻。1937年十二月，台灣神職會公佈「本島民屋正廳改善實施要項」，指出「民屋正廳之改善為貫徹本島皇民化的絕對要件。」在此要項中甚至提出了家庭神座標準配置，冀由供奉日本傳統之神宮大麻、神社神符與代代靈祖來取代台灣傳統信仰中之神明與祖先。台灣之許多民宅因而在此期間內，出現假象式的皇民化成果，以應付日警之檢查。不過這些強制性的文化改造成果，在戰後日本人撤走之後，已經不復存在。

歸納東洋歷史式樣中的不同風格

日人治台五十年，在台灣興建的建築中，最具日本文化色彩的建築物乃是以日本傳統建築為藍本所興建的各種建築或者是創新的日本古典式樣新建築。但也是由於這些建築的日本意識太過於濃厚，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因為反日情結而不見

容於這些建築的存在，曾經有意識的加以拆除或改建，所以現今保存狀況良好的實例，若與西洋歷史式樣之數量相較，可說是極為有限。

然而雖然數量不多，但與西洋風情的建築中有許多西方建築語彙並不標準一事相較，台灣的日本建築語彙則相當道地。換句話說，台灣各種日本風格建築的興建，其實是和日本本土上同類建築沒有多大差異。在日本的傳統建築中神社、寺殿及民居是三種最常見的建築類型，在台灣也不例外，因而我們可以將之統稱為「日本傳統式樣建築」。當然如果細分，神社、寺殿及民居其實各有其獨特的規制與造型，台灣的同類型建築也都遵循其傳統模式。

除了傳統建築之外，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也面臨著現代建築缺乏本土特色的危機，因而如何創造一種新的日本建築風格也是日本近代建築發展過程中一項很重要的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以鋼筋混凝土模仿傳統木構造的新建築，也出現企圖結合日本古典建築與西方古典建築的「帝冠式樣」和企圖結合日本古典建築與西方現代建築的「興亞式樣」。「帝冠式樣」和「興亞式樣」並不屬於特定的建築類型，由於它們已與傳統建築有著實質上的差異，屬於一種「日本古典式樣新建築」。一九三〇年代，適逢日本軍國主義最興盛之際，在日本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內，興建以帶有日本色彩的建築也是一種文化領域的宣示，在這種情況下，台灣順理成章的出現此類建築其實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另一方面，由於文化因素使然，在其它風情的日治建築中，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局部使用日本裝飾紋樣或採用日式空間佈置和式的情況。這些建築雖然乍看之下，並不是以日本風格為主導，但是在細看之下，卻仍能發現一些帶有日本色彩之處。

表現東洋風情的元素

台灣的日治時期建築中的各種日本風格，有其各自的表現手法與特殊的建築語彙。在屋頂、門廊、木構元素與細部、鋼筋混凝土仿木構元素與細部、天花、榻榻米、空間佈置、傢俱與庭園中，我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種日本建築的特徵。

(1) 屋頂與門廊

傳統日本建築中，屋頂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特徵，其雖然不像西方歷史式樣建築中的屋頂差異如此的大，但是仍然有數種不同的差異，以妻切屋頂（中國建築中的懸山）及入母屋屋頂（歇山）最為普遍。妻切屋頂為雙坡式的屋頂，空間為長方型，屋面突出於短向屋身山牆之外，許多神明造與流造的神社本殿之屋頂均採用之，伊勢神宮與賀茂神社中均可看到。在台灣，台灣神社、台南神社及桃園神社中都有妻切屋頂的例子。入母屋屋頂雖然仍為長方形空間，但卻為四坡式的

屋頂，許多寺院及武德殿均加以採用，京都東大寺的山門，京都的武德殿均屬之。在台灣，神社以外的重要日本式樣建築也大都採用入母屋屋頂，台南北白川宮御遺蹟地祭堂、鎮南山護國臨濟禪寺、北投普濟寺、中和圓通禪寺與台南彰化及南投等地的武德殿均是很好的例子。方形屋頂（四角攢尖頂）則可以在高雄市役所、高雄驛以及一些較小規模的建築中如台中放送局播音塔（1908）、台北放送局播音塔（1910）台北明治橋燈塔（1930 今中山橋，已拆）中看到。

有時候，屋頂的山牆面，亦即所謂的「破風」也會出現於主要屋頂上，其作用一為門廊之頂，另外一種作用很像西方建築閣樓上的老虎窗。破風為圓弧形者稱為「唐破風」，三角山形的稱為「千鳥破風」，台南武德殿的門廊、屋頂及高雄驛的屋頂中都有破風的存在。除了屋頂本身的形式之外，屋頂上的屋瓦及山牆裝飾懸魚則是屋頂上具日本特徵的元素。屋瓦從材料上基本上為土質黑瓦與銅瓦為多。屋脊收頭的瓦通常造型特殊，稱為「鬼瓦」的最多，少部份為鷗尾。有些建築除了主屋身之外，還會設立向拜（門廊），其屋頂也多是採用唐破風或者是入母屋屋頂。

（2）木構元素與細部

傳統日本建築是木構造為主，因而新建築若採取木構造，則能較清楚的表現日本風情。基本上，台灣日治時期這些建築的木構可以分為結構部份與裝修部份。結構部份以柱子、虹樑、斗拱、蟄股及木鼻最具特色。「蟄股」是屋簷下兩道水平構材間的元素，其名乃是因為構件乍看下，有點像張腿青蛙的股部。木鼻是水平構件的收頭，有具象的圖像也有抽象的圖樣。裝修部份為結構材間的填充構件或者是裝飾細部，門窗也可以屬於裝修之部份。傳統的和室門是室內經常看到的元素，抬高建築的欄杆、木門扇與支摘窗則是建築重要的外貌特色。除了木構件外，應用於木構造元素的五金構件也是特色之一。桃園神社與鎮南山護國臨濟禪寺是現存日治木構建築中保存較好者。在民居式樣中，水平層層相疊的雨淋板則是重要特色。

（3）木構與仿木構元素與細部

日治時期，台灣除了真正的木構造之外，日人還以鋼筋混凝土模仿傳統木構造興建許多建築。在這些建築中，我們可以看到相當精緻洗石子仿木構細部，包括上述木構中的柱子、虹樑、斗拱、蟄股、木鼻及欄杆，可以說是應有盡有。高雄市役所與各地的武德殿中都可以看到這類的元素與細部。

（4）天花、榻榻米與室內佈置

榻榻米是日本在空間設計上重要的元素，而且不僅存在於日本風情的建築物，就連一些洋化的建築中，也會設有榻榻米的空間，尤其是所謂「座敷」的起居空間。榻榻米是一種模距化的元素，因而很容易藉之來控制空間的大小，而榻

榻榻米室也都會配上特殊的日式擺設。現存的日治建築中，除了住宅、招待所與溫泉旅館之外，保存有榻榻米的空間的並不多，北投普濟寺是現存的少數特例，整個大殿仍然全部保存著榻榻米地板。與地板相對的，許多日治建築中有系統的藻井式分格與木質建材的天花也是日治建築的另一特徵，只可惜現存的完整的並不多。

(5) 特殊日本圖騰或獨創的日本新元素

除了影響建築外貌很大的屋頂與木構等主要元素外，有許多日治時期的建築雖然基本上是西洋風情、台灣風情或現代風情，但是在建築之中，仍然可以看到局部應用傳統日本圖騰的例子，例如在台南勸業銀行中就出現日本的福神浮雕，後壁阮宅有富士山，高雄武德殿有類似箭標的裝飾。另外在一些日本古典式樣新建築中，東西方元素混合而成的特殊柱頭型式及細部也都是帶有新意的日本風情，而這種特殊日洋折衷的處理方式也見之於圓通禪寺等佛寺中。另一方面，原本置放於神社前的銅馬也是一項極具日本色彩的元素。雖然大部份的神社已拆，但是在某些城市中則保存了銅馬，位於台南市忠烈祠前的原台南神社銅馬即為一例。部份神社前也有所謂的高麗犬。

(6) 庭園

建築物之外，庭園也是很容易表現日本風情之處。小橋流水與石燈幢則是最普遍的日本庭園元素。而日本庭園除了存在於公園等開城市放空間之外，也存在於公共建築與住宅的庭園之中。而且不是日式風情的建築也會設置日本庭園，而且也會存在於西洋風情、台灣風情或現代風情的建築之中。台北新公園（二二八紀念公園）、台北總督官邸、總爺糖廠、甚至是台中清水的黃宅與神岡的筱雲山莊中都還存在有日本庭園的痕跡。除了庭園，日本傳統家具器皿也可以表現日本色彩，不過保存於建築中的並不多，台南開山神社中的神輿（神轎）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且本身就像是一座日本傳統建築。